

艺术管理专业建设的新文科转向

任珊珊

(湖北美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艺术管理是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将艺术与管理相结合,旨在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对艺术活动中所出现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研究和解决,融合了文化政策与法规、艺术社会学、艺术理论、经济学、博物馆学、艺术市场学及现代管理学等于一身的艺术管理学,也逐渐在当今艺术市场体制下成为一个关注度很高的新型学科。“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恰恰是对艺术管理专业在新形势下学科体系、研究体系和人才培养与培养体系完整建构的有效指导,因此,艺术管理专业建设的新文科转向符合时代需求、形式需求和专业需求。

[关键词]艺术管理;新文科;专业建设;转向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683

一、“新文科”与“大艺术管理”

“新文科”讨论的核心背景是为中国建设可以比肩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专业学科集群,这其中学科通融体系搭建、课程改革、人才培养以及产学研合作均为各学科未来的发展指明了目标。很多学者追溯新文科的概念提及最早来自美国的希拉姆学院在2017年提出的新的学科发展方针,该学院在提出本思路的意图在于实现学科互融,将传统文科与时代发展前沿的理学学科进行融合,实现交叉学习平台。事实上希拉姆的新文科与我国“新文科”建设的思路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区别。“新文科”最早在我国被提出是在2019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后来在山东大学(威海)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又给予了明确的方向,指出新文科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提升国力、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高等教育强国、文科教育发展”等核心共识,2021年3月教育部又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也多次对新文科的实施和执行给予了具体指导意见。新文科之“新”并不需要空穴来风地创造概念,而是借助于传统文科的丰厚学理积淀而完成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转向,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等教育学科规划。中国新文科的内核在于打造具有中国气象的学科体系,因此在中国进行“新文科”专业建设的研究具有其独创意义。

新文科建设要义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建设和培养适合中国特色的复合型、应用型专业,特别是对于新兴学科的扶植,而艺术管理就是其中被重点提及的专业之一。正如黄昌勇(2020)指出,“宽基础的综合性、交叉性应该成为艺术管理这个学科建设未来的方向”。艺术管理专业建设,特别是宏观思路下的“大艺术管理”学科规划,对标新文科建设的指导思路和要求,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艺术管理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艺术市场大繁荣而被引入国内的艺术教育体系中的,同时也是近30年我国发展较快的新兴专业,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培养创新型人才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3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学实践,2016年“艺术管理”成功纳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前全国已有34家高校申请到了专业学科代码,成为新设专业中布点数全国前五名的文科专业,其交叉性与复合性特征也符合国家对“新文科”的研究目标,因此对艺术管理基础学科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新兴专业的规范化发展。“艺术管理”学科的官方认定是本学科发展至今的必然形式,也是艺术理论与艺术管理各界研究和从业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对“艺术管理”学科理论及学术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与逐渐深化,包括对其外延的扩展,特别是各个学科点布局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各相关利益高校、研究部门和行业对人才培养形式的深入改革和紧密合作,都为“大艺术管理”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大艺术管理”概念的精准确立,是“艺术管理”面向“新文科”转型的必要前提。

首先,“艺术管理”之“大”不在于全面、模糊和空洞地将所有艺术管理相关的知识囊括于漫无边际的大概念中,而是力求从宏观到微观,对艺术管理的概念进行更为明确的阐释和解析,使艺术管理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确立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

其次,“艺术管理”之“大”在于总结和提炼,而不在于凭空创立新概念。“大艺术管理”的概念更多是综合、梳理和归纳,将零散于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音乐等细分领域的艺术管理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共同性和基础学理进行综合,形成艺术管理学科的基础性、指导性、核心性学术体系。

最后,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已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善的艺术管理教学体系,但事实上,“大”艺术管理中戏剧、影视、剧场、视觉艺术等分支专业因为其各自的创作方式、推广形式、承载空间以及观众接受度不同等问题,也迫切需要研究者有针对性地对模糊混乱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推导,进而形成明确、规范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二、“新学科”——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的思路转向

在引入我国前20年,“艺术管理”大多基础理论都来自西方研究体系,在我国本土植入后,实现了几次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的思路转向,最终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术体系将成为本专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独有的艺术创作形式和市场关系被研究,李军(1984),龚心瀚(1988)等学者的研究中都提及了呼吁尽快建立中国文化艺术管理学科的相关理念,这个阶段可谓艺术管理学科概念在中国的形成期,这段时间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于专业概念的定义和诠释部分。

1984年后多所高校和艺术机构开始尝试举办“艺术管理研修班”,编写相关教材,比较典型的有1983年7月文化部文化干部学院(1987年9月后改为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成立文化管理教研室,开始编写教材;1984年夏上海市文化局委托上海市戏曲学校举办“艺术管理专修班”;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同济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相继开展相关研修班或进行其他专业建设工作,至此艺术管理完成了从概念到学科和专业建设的转型。

进入21世纪,艺术管理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更是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进入第三次转向,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国内学者余丁、曹意强、董峰等学者先后探讨了艺术管理学科的宏观架构及理论基础;孙怡先(2002)在研究中将艺术管理分为“艺术经济管理”和“艺术行政管理”两大类;成乔明(2005)在随后的研究中质疑了这一框架,并提出宏观、中观、微观的分类方式,王希俊等又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和研究。这些研究对于艺术管理学科理论框架的搭建与后期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意义。虽然对于学科大体系的建构、实际执行层面所面临的不同研究对象、不同学科门类的深入细分研究等问题,目前的

研究并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但是中国艺术管理的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已然形成。

另外,各大高校在自身的培养方案建构中也都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专业的区分也存在一定的混淆,不同学院的相关专业名称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式。比较突出的两大问题,其一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基础学理支撑,很多高校的艺术管理过于重视实践和案例教学,缺少高等教学的完整性、逻辑性、内涵不足、知识碎片化明显,不利于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或则有些高校过分依赖现有理论和知识、导致课程内容僵化、死板、不符合现代学科和社会发展要求。因此必须加强学科体系化意识、进行系统研究来推动专业建设,艺术管理专业的“新文科”转向可视为专业知识结构、学术体系与研究方式的第四次转向,本次转向有助于形成系统的学科理论,建立文化自信,因此至关重要。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点。

(一)分析、评估、解释以西方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视觉艺术管理及其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及其影响。主要包括:视觉艺术管理的历史沿革、发展规模、国外高校剧院视觉艺术管理学科专业的设置情形,以及专业名称,专业归属,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师资配置。不同国家和地区视觉艺术管理导论性课程设计还是存在较大区别,这背后逻辑以及现实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一一作出解释。从而为整个课题研究提供基本的参照。

(二)在整体上分析、判断、预测中国视觉艺术管理领域发展的基本情形,通过详实的资料整理,为课题研究乃至政府决策提供必不可少的数据和事实,为建设视觉艺术管理稳定的学术基点作出贡献。

(三)综述、反思、推进当下国内“大”艺术管理(针对所有艺术活动的管理行为)和“小”艺术管理(音乐、影视、剧场、视觉等细分研究)的理论研究。艺术管理是一个庞杂和深刻的体系,在学科思维与方法论层面涉及研究领域与选题、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现状与趋势。对国内艺术管理研究成果作全面梳理、分类和审视,不仅有助于完善艺术管理学科化进程,而且也有助于为专业教育提供学术资源。

(四)构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适合中国发展规律的艺术管理导论性教育体系以及人才培养的研究逻辑。

三、“新变革”——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的建设转向

艺术管理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较为完整之后,在基于“新文科”转向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的是面对“新文科”建设要求以及文化、科技以及旅游融合情势,如何创新应用性知识形态与教学形态,构建以交叉、融合、应用为特征的艺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重塑学科专业内涵与品质。艺术管理专业建设的新文科转向,就是在教学中通过专业建设理念与目标、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新型知识形态与教学形态、核心课程模块与教学模式、产学研资源转化教学资源、实验室等方面综合建设,构建系统的、新型的具有以“交叉、融合、应用”为特征的艺术管理专业教学体系。

(一)利用新时代科技发展状况,对传统艺术管理课程体系进行重组和补充。科学建设新时代下艺术管理的专业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关注国家发展规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需要,并以此优化艺术管理专业课程结构,有效分配基础理论课程、核心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占比。在教材建设上关注理论逻辑搭建,关注最新案例的整合与分析,关注艺术管理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时代影响下的新特征,随时更新、重组核心课程。人才培养中关注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转向,

(二)多学科融通,专业互融和产学互融相结合。社会进一步发展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因此艺术管理的新文科转向,不仅仅是完善“新”的学术体系,也应该充分考虑理论应用和实践路径之转向。在传统学科边界逐渐模糊的时代背景下,艺术管理与教育学、社会学、人类

学、管理学、经济学、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的融通优势被充分发挥。另外,与行业的联系也应该更为紧密,作为经验科学的艺术管理,其知识构成很多零散于行业内部的经验行为和行中,在专业建设上整合这部分知识积累,是艺术管理实现新文科转向的重要突破口。

(三)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应兼具人文属性、市场属性和管理属性。艺术管理的人才培养立足于培养既具有审美感知和人文积淀,同时又熟悉商业规律、管理策略的全能型人才。事实上,这种人才培养的期许虽然远大,但是能够真正掌握全能型技能的人才屈指可数。因此“大”艺术管理,更需要“小”人才培养路径。针对每个学校的资源最大化优势和当地行业需求,艺术管理落实到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和模式改革上要充分细化。“大艺术管理”在于学理性统一,有规范的学科基础理论,“小艺术管理”在于落实上细化,注重实际需要。也就是在宏观基础学术体系的指导下建设具有自身特色、当地特色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落实机制。例如上海戏剧学院对于剧院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培养体系,借助上海丰富的演艺资源,总结挖掘以“剧场、剧团、剧院运营、管理、发展”的专业发展战略定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四、“新融通”——成果与实践的输出路径转向

在新文科转向的路径下,艺术管理的成果输出和实践形式也可以实现“新融通”。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而形成的线上交易与监管平台的完善;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智能美育的社会性服务;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历史、材料等的系统挖掘;更可以形成丰富的艺术样态。

另外高层次系统的学术成果输出,特别是基础学科理论重大成果的输出,也是新时代环境下扩大艺术管理学术影响力,推进中国文科建设整体发展的重要举措。

最后,关注中国艺术管理的区域化发展,使艺术管理的实践输出路径真正落实于社区、乡村、城镇、文化核心地等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地方。中国艺术管理的形成不仅仅是对西方理论的总结,更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只有落实区域化成果输出路径,才能使专业建设新转向真正体现中国精神,实现中国内涵在世界一流学科发展中的展现。

艺术管理的新文科转向不仅仅是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要求,更是顺应国家文化发展形式和建构中国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也是艺术管理专业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有效指导,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在各研究机构和行业的努力下,具有独立话语权的的艺术管理学科建设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 [1]孙仪先.关于艺术经济学研究重点与框架的思考[J].装饰,2002(2):11.
 - [2]成乔明.论艺术管理的创新[J].装饰,2005(2):113.
 - [3]王希俊等.当前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缺陷及其重构[J].中南大学学报,2011(12).
 - [4]董峰.艺术管理概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
 - [5]吴岩.加强新文科建设,培养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J].中国编辑,2019(2).
 - [6]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思路与设计[J].中国大学教学,2019(6):54.
 - [7]周星,任晟姝.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艺术学科综合性发展的思考[J].语言文学研究,2020(3).
 - [8]顾亚奇,王立锐.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艺术管理学科发展的新趋向[J].艺术管理,2021(1).
- 基金项目:湖北美术学院2020年度教研课题“‘视觉艺术管理概论’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编号202015)。